

范鹏 王福生 总主编

陇上学人文存

范汉森卷

甘肃人民出版社

陇上学人文存

范汉森 卷

范汉森 著 李君才 刘银军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陇上学人文存·范汉森卷 / 范鹏, 王福生总主编 ;
范汉森著 ; 李君才, 刘银军编选. — 兰州 : 甘肃人民
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7-226-05224-2

I. ①陇… II. ①范… ②王… ③范… ④李… ⑤刘…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马克思主义哲学—文集③西方哲学—文集 IV. ①C53②B0-0③B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97613号

出 版 人: 王永生

责任编辑: 陈拥军

封面设计: 王林强

陇上学人文存·范汉森卷

范鹏 王福生 总主编

范汉森 著 李君才 刘银军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张 10.5 插页 7 字数 265千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978-7-226-05224-2 定价: 60.00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印厂联系)



《陇上学人文存》第一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陆 浩 刘伟平
主 任：励小捷 咸 辉
副 主 任：张建昌 张瑞民 范 鹏
委 员：张余胜 吉西平 魏胜文 高志凌
张 炯 安文华 马廷旭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珽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 主 编：范 鹏
副总主编：魏胜文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二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刘伟平

主任：连 辑 咸 辉

副主任：张建昌 张瑞民 范 鹏

委员：张余胜 吉西平 魏胜文 高志凌

张 炯 安文华 马廷旭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琰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 主 编：范 鹏

副总主编：魏胜文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三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刘伟平

主任：连 辑 张广智

副主任：张建昌 范 鹏 马成洋

委员：管钰年 吉西平 王福生 陈双梅

朱智文 安文华 刘进军 马廷旭

张亚杰 李树军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珽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 主 编：范 鹏

副总主编：王福生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四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刘伟平

主任：连 辑 夏红民

副主任：张建昌 范 鹏 高志凌

委员：管钰年 吉西平 王福生 陈双梅

朱智文 安文华 刘进军 马廷旭

张亚杰 李树军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珽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 主 编：范 鹏

副总主编：王福生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五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林 铎
主任：梁言顺 夏红民
副主任：张建昌 范 鹏 彭鸿嘉
委员：管钰年 王永生 王福生 朱智文
安文华 马廷旭 王俊莲 张亚杰
李树军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珽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 主 编：范 鹏 王福生
副总主编：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六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林 铎

主 任：陈 青

副 主 任：范 鹏

委 员：管钰年

马廷旭

李树军

彭鸿嘉 王福生

王永生 朱智文 安文华

王俊莲 王 琦 方忠义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田 澍 刘进军 伏俊珪 张先堂 陈晓龙

李朝东 郝树声 傅德印 程金城 蔡文浩

总 主 编：范 鹏 王福生

副总主编：马廷旭

编 辑 部 主 任：董积生 周小鹃

编辑部副主任：赵 敏 胡圣方

学 术 编 辑：丁宏武 丹 曲 王志鹏 艾买提

庆振轩 孙 强 李君才 李瑾瑜

汪受宽 郭国昌

总 序



陇者甘肃，历史悠久，文化醇厚。陇上学人，或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学者，或外来而其学术成就多产于甘肃者。学人是学术活动的主体，就《陇上学人文存》（以下简称《文存》）的选编范围而言，我们这里所说的学术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存》精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甘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的代表性著作，每人辑为一卷，或标时代之识，或为学问之精，或开风气之先，或补学科之白，均编者以为足以存当代而传后世之作。《文存》力求以此丛集荟萃的方式，全面立体地展示新中国为甘肃学术文化发展提供的良好环境和陇上学人不负新时代期望而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的新贡献，也力求呈现陇上学人所接续的先秦以来颇具地域特色的学根文脉。

陇原乃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人文学脉悠远隆盛，纯朴百姓崇文达理，文化氛围日渐浓厚，学术土壤积久而沃，在科学文化特别是人文学术领域的探索可远溯至伏羲时代，大地湾文化遗存、举世无双的甘肃彩陶、陇东早期周文化对农耕文明的贡献、秦先祖扫六合以统一中国，奠定了甘肃在中国文化史上始源性和奠基性的重要地位；汉唐盛世，甘肃作为中西交通的要道，内承中华主体文化熏陶，外接经中亚而来的异域文明，风云际会，相摩相荡，得天独厚而人才辈出，学术思想繁荣发达，为中华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以来，甘肃相对于逐渐开放的东南沿海而言成为偏远之地，反而少受战乱影响，学术得以继续繁荣。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大



后方，接纳了不少内地著名学府和学者，使陇上学术空前活跃。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更是为国家民族的新生而欢欣鼓舞，全力投入到祖国新的学术事业之中，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涌现出众多知名专家，在历史、文献、文学、民族、考古、美学、宗教等领域的研究均居全国前列，影响广泛而深远。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几次对当代学术具有重大影响的争鸣，不仅都有甘肃学者的声音，而且在美学三大学派（客观派、主观派、关系派）、史学“五朵金花”（史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重点研究的历史分期、土地制度史、农民战争史等五个方面的重点问题）等领域，陇上学人成为十分引人注目的代表性人物。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学者更是如鱼得水，继承并发扬了关陇学人既注重学理求索又崇尚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形成了甘肃学者新的风范。宋代西北学者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乃中华学人贯通古今、一脉相承的文化使命，其本质正是发源于陇原的《易》之生生不已的刚健精神，《文存》乃此一精神在现代陇上得到了大力弘扬与传承的最佳证明。

《文存》启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在选择入编对象时，我们首先注重了两个代表性：一是代表性的学者，二是代表性的成果，欲以此构成一部个案式的甘肃当代学术史，亦以此传先贤学术命脉，为后进立治学标杆。此议为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首倡，随之得到政界主要领导、学界精英与社会各界广泛认同与政府大力支持，此宏愿因此而得以付诸实施。

为保证选编的权威性，编委会专门成立了由十几位省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著名学者组成的专家指导委员会，并通过召开专题会研讨、发放推荐表格和学术机构、个人举荐等多种方式确定入选者。为使读者对作者的学术成就、治学特色和重要贡献有比较准确和全面的了解，在出版社选配业务精良的责任编辑的同时，编委会为每一卷配备了一位学术编辑，负责选编并撰写前言。由于我院已经完成《甘肃省志·社会科学志》（古代至1990年卷，1990至

2000年卷)的编辑出版工作,为《文存》的选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基本依据,加之同行专家对这一时期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研究,使《文存》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同期内甘肃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状况。

我们的愿望是坚持十年,《文存》年出十卷,到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达至百卷规模。若经努力此百卷终能完整问世,则从1949至2009年六十年间陇上学人以“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献身学术、追求真理的轨迹和脉络或可大体清晰。如此长卷宏图实为新中国六十年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全部成果的一个缩影,亦为此期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业绩的一次全面检阅,堪作后辈学者学习先贤的范本,是陇上学人献给祖国母亲的一份厚礼。此一理想若能实现,百卷巨著蔚为大观,《文存》和它所承载的学术精神必可存于当代,传之后世,陇上学人和学术亦可因此而无愧于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并有所报于生养我们的淳厚故土。

因我们眼界和学术水平的局限,选编过程中必定会出现未曾意料的问题,我们衷心期望读者能够及时教正,以使《文存》的后续选编工作日臻完善。

是为序。

2009年12月26日

编选前言

范汉森先生，江苏海门人，1937年出生于一个小商人家庭。先生的父亲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因受到“长三角”地区“时新”教育观念的影响，对孩子的教育有着一些“时新”的想法。他赞成孩子的早教，在先生刚满四岁时，就被送到一所国民学校“开蒙”当一个预备生（相当于现在的学前班）；他还主张孩子应有自己的“课外阅读”，在他自己还是单身青年的时候，就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持续买了一大箱的古典小说，后来又在旧书刊收购中，挑选出一批中学教材，留给孩子们阅读。因此，在先生刚刚具有一点阅读能力的时候，就开始与书籍为伴，并因此养成了终身爱读书的习惯。

1953年，先生考取了江苏省的名校南通中学高中部。南通中学较为完整的藏书对他有着特别的吸引力。他在课余，大量阅读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图书和学术刊物，广泛的阅读使他渐渐喜欢上了哲学。他决心做一个哲学工作者，运用哲学工具，来启发民智和推进社会进步。因此，在1956年高考中，他以第一志愿报考北京大学哲学系并被录取。在进入北大以后，又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条件，选择西方哲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

当时的北大哲学系，有着众多的高水准的导师，尤其是西方哲学。不仅从国外学成回归的名师，绝大多数汇集在这里，而且北大哲



学系有着充足的文献资料可供阅读。在当时,北大从“五四”时期形成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治学传统依然存在,因而使这个立志献身哲学事业的学子感到异常的幸运。

然而,不幸紧跟着幸运而来。1958年整团期间,先生因在反右期间“同情右派”和“思想右倾”遭到批判,并因此被开除学籍。正因为这次处分,1961年毕业时被分配到大西北的甘肃兰州——西北民族学院,到了民院之后,又被人事部门分配到图书馆管理图书。对一个有志于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的青年才俊来说,这样的安排自然是一种大不幸。

在先生遭遇的不幸当中,又有一点值得庆幸。图书馆的馆长是一位忠厚长者,他爱才惜才,利用自己手中的一点点权力,指定先生担任图书馆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并让先生担负起图书推介和咨询的任务。要做好图书推介和咨询,首先负责人自己要大量读书,于是先生利用晚上时间集中精力来读书,每天长达5到6小时,有的精读、有的泛读、有的随手翻阅。正是由于这样近乎“疯狂地”阅读,十年不到,馆藏社科图书几乎被先生翻了个遍。读书杂而多,大大拓宽了先生的眼界,优化了先生的思维,塑造了先生后来的学术格局和学术风格,可谓因祸得福,坏事变好事。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阶级斗争为纲和斗争哲学盛行的年代,厄运会随时袭来。1970年,甘肃省革委会中一些极“左”分子,痴迷政治投机,打着“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的旗号,说“民族问题”在中国已经不再存在,强行撤掉西北民族学院。随着学校被撤销,数名民院的工作人员被下放到民族地区。在这场大驱逐中,有“前科”的先生自然不能幸免,他被分配到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当了一名行政干部,他的工作就是在一些贫困乡镇“扶贫”。

在贫困乡镇“扶贫”的辛苦自不待言,同时也离先生钟爱的哲学

专业越来越远。但是,先生并未因此而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而是把“扶贫”看作历练自己、深入实际的机会。他沉下心来与农民一起“改土造田、兴修水利”,兴办小型水电工程以及改变耕作方法,就这样整整干了10年。其中有4年,因在一个民族“大队”扶贫成绩显著,在全县大会上还受到表彰。即使在下乡“扶贫”的艰苦岁月里,先生利用“山川秀丽”和“无人干扰”的特殊条件,抱着“位卑不敢忘忧国”的使命感,对国家命运和前途,进行着认真地思索,这些思索成为他后来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的一种宝贵资源。

1978年,先生蒙冤20年后终于获得平反。平反后,随即调入新成立的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从事哲学研究工作。这时,他想到20余年的荒疏,心痛之余,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自觉地为自己“补课”。他通过重读哲学经典、参加学术会议以及与同行交流等方式,以期寻找失去的“世界”和无端浪费的光阴。1982年,先生调入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开始为省内高中层干部辅导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先生讲课视野开阔、逻辑严谨、新意迭出、见解独到、语言生动,党校学员被先生的大家风范折服。1995年,甘肃省委党校开始招收哲学专业研究生,先生担任导师组组长,他讲授的《西方哲学史》是学生们最喜爱的课程之一,他培养的研究生,有的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有的成长为高校的教学骨干、学科带头人。这些学生每每谈及先生,无不充满感激和尊敬。由于教学和研究工作成绩显著,先生1989年被评选为全国优秀教师,1993年起开始享受国务院发放的特殊津贴。先生的事迹,先后被《中国社会科学家大辞典》、《北大人》和《甘肃专家》等辞书登载。

二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通过对时代精神的提炼和表达而影



响时代，但正是时代本身为哲学提供了所提炼的材料、所表达的呼声。只有密切关注时代的状况，把握时代的脉搏，反映社会的要求，哲学才能反过来对社会发生影响，给时代留下烙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催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此后的岁月中，由于摈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中国取得了异乎寻常的进步和发展，面貌为之一新。改革开放改变了国家的命运，凸显了哲学的地位和作用，也开启了范汉森先生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先生紧跟时代步伐，紧贴改革开放实际，以时不我待的精神状态，持续不断地进行了具有鲜明风格和维度多元的哲学思索。先生的研究领域和学术成就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邓小平哲学思想，改革开放的智慧之源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因此，他的思想特别是他的哲学思想，指引着改革开放全过程。或者说，改革开放过程中，处处展现出邓小平哲学智慧的无比魅力。

邓小平在哲学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不渝地把发展生产力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马克思、恩格斯这样说过：“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对于这一点，邓小平深信不疑。“文化革命”中，他因此被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在他恢复工作之后，依然专心致志地抓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他倡导的改革开放的中心内容，依然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使中国变为现代化的强国。

邓小平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还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